晚清郭嵩焘：敢说真话的“人民公敌”

一个民族要生存下去，不能没有说真话的人，让谁来说出真理？命运不仅要选择有识之士，还要选择无畏之人。

**奏谤**

　　清朝有个规定，要出使各国的大臣都写日记。日记要将所见所闻，所作所为，详细记载，随时咨报。郭嵩焘将他的出使日记，抄寄一份，给了总理衙门。这份日记，两万来字，总理衙门以《使西纪程》为名刊印出来。书一问世，就引爆了舆论，让人大跌了一把眼镜。

　　有个名叫何金寿的人，时任翰林院编修，为日讲官，出来弹劾郭嵩焘，说他“有二心于英国，欲中国臣事之”。何某同事、翰林院侍讲张佩纶更积极，请朝廷撤换使臣，否则有违民心了。还有那位李慈铭在日记里，对郭诛心：诚不知是何肺肝，居心何在！

　　那时，皇帝尚未亲政，一切都由太后作主，慈禧太后似乎忘了她曾经对郭嵩焘的承诺，放任朝野上下的攻击，并下令将《使西纪程》毁板。

**后来，梁启超在《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》里还提起此事：“光绪二年，有位出使英国大臣郭嵩焘，做了一部游记。里头有一段，大概说，现在的夷狄和从前不同，他们也有二千年的文明。嗳哟！可了不得。这部书传到北京，把满朝士大夫的公愤都激起来了，人人唾骂……闹到奉旨毁版，才算完事。”**

　　当《使西纪程》被诏令禁毁时，李鸿章却自称反复看了四遍，并在给友人信，为郭嵩焘抱不平，说“筠仙虽有呆气，而洋务确有见地”，朝野却如此参毁奏谤，恐怕达官贵人从此皆引为鉴戒，噤声若寒蝉，中土必无振兴之期，日后更无自存之法，可为寒心。

　　偌大的中华，连一本讲真话的书都容不下，李鸿章也心寒了。

　　郭嵩焘远在国外辩解了几句，便遭严旨申斥，斥他“固执任性”，所见实属褊狭，本应立即撤回，严行惩戒，姑念其驻英以来，办理交涉事件，尚能妥帖，所以宽大处理，如若固执己见，则以国法论处。

　　郭想着太后召见时，言犹热耳：“你只一味替国办事，不要顾别人闲说，横直皇上总知道你的心事。”这话还算不算数？如今太后却变成了一块落井的最大石头。明白了，自己只是被人利用来救一时之危机，危机一过去，自然卸磨换驴，维持大清朝的“国体”，这便是太后的与时俱进。

　　他光明磊落，怎么有辱国体了？就因为在日记里，赞美了大清朝的敌人——那个发动了鸦片战争、火烧圆明园、还要大清朝去道歉的英吉利？李慈铭《越缦堂日记》说他极度吹捧英国“法度严明，仁义兼至，富强未艾，寰海归心”，这哪里还是大清朝的臣子！

**辞官**

　　清流汹涌，看来必须辞职了，他上了一道辞职的奏折，销差去也。但他内心为集权制下的权力制衡忧愤不已，慈禧安排刘锡鸿作他的助手，其实是安插耳目，以监督外臣。刘出京时，携带一堆空白奏本，就是为弹劾之用。这时，郭嵩焘才幡然，原来出京之日的“和衷共济”，实则早已异心，而捏造各种罪名向朝廷打小报告，足见其蓄谋之深远。但郭没有归咎自己的言论，他坚信自己所说的是真理，没有一句不实；他也没有归咎于制度安排，王权就是制造矛盾找麻烦的。不管这些了，他由衷地赞美了英国的民主制，因为只有民主制，才能“一味替国办事”。

　　威妥玛来访，两人谈起俄罗斯土耳其战事。威妥玛说，我在中国很久，知道中国的情形与土国差不多。郭说，中国有胜于土耳其者，也有不及者。胜之者，在以礼自处，无胜人之心，不喜黩武。若从“仿行西洋兵制，设立议政院”言之，则中国还不及土耳其。说中国政治制度不及英国，已有人骂他是汉奸了，又说中国有不及土耳其者，那该骂他什么好呢？

　　威妥玛还说，中国若能内修，则无惧强敌，不内修，则东西两洋皆将为敌。又说，中国有地利，有人才，就是没有好政治，所以，不能发挥作用。购买西洋几尊大炮，几支小枪，修造几处炮台，于事无补。何况近年才知有外交，尚蒙昧不知有内政，于百姓民生一切，还是不管不问，如此国家岂能自立？

　　郭嵩焘说，中国说的人多，做的人少，做的人被说的人折磨，我在这里也没什么用了，不如销了差，早点回国去。

　　接替他的人，朝廷终于安排好了，是故人曾国藩之子曾纪泽。当初朝廷以他为使，就是不得已，但凡有人能接替，就不会用他这个众矢之的。

　　曾纪泽来电，提出在法国接印，郭嵩焘不高兴，致书纪泽：“吾以英使兼法，接任大臣不至伦敦，无可交卸之理。持印赴法以求交涉，非所闻也。”曾纪泽想节俭，以为郭嵩焘回国反正要途经巴黎，顺便把印带来交接倒也省事。但经郭一说，纪泽就来伦敦了。

　　纪泽公事公办，公事办完了，再论亲情。一起告辞了英国外相，晚上，纪泽请他吃饭，纪泽所有随员都在。后来，有人告诉他，说这一顿饭是纪泽要所有随员凑钱请他，以省公费。他心里明白，此举是要让所有人都有机会向他表示尊敬和感激。

　　恶制度难免有恶习，人心还是向善的。郭嵩焘早就是中国传统的另类，如今又成了王权主义的异己。而曾纪泽还要在大清朝的制度安排里做事，即便是恶习，也得坚持。郭喜欢英国方式，并不认为“英国方式”是英国人独有的，总以为“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”。

**他很理想，办外交也求理想，这是他伟大的地方。在国际外交舞台上，从来不缺老练的外交家，如俾斯麦、李鸿章，但令他佩服的还不是这些人，而是英国首相迪斯雷利，那句“没有永恒的朋友，只有永恒的利益”，便出自他口。**《使西纪程》却未见此句名言，郭使英期间，正是迪氏执政时期，郭对英国的赞美，当然也包含了对迪氏的赞美。然郭赞美英国，多在理想层面，碰了利益的钉子也不改变。

**身后**

　　一到上海，就面临选择，是沿海北上，去朝廷报到，还是逆江西行，回老家去？内心深处，郭嵩焘已与朝廷决裂了，当然要回老家去！但恭亲王、李鸿章皆有意安排他先期回京，是要朝廷有始有终，给他一个交待。可他此番归来，有了新觉悟，认定了在这种体制内，“洋务之不足于有为”，他无法容忍，凡是跟他作对，以骂他、侮辱他为己任者，无不立时扬名，被朝廷重用。他说：“朝廷挟此术以办理洋务，万无以善其后，奈何枉己以从之哉！惟能引身自远而已。”

　　他说这一番话，刚好是在光绪五年闰三月，见于《郭嵩焘先生年谱补正及补遗》。中国民间有“闰月不吉”之说，不祥之人闰月归来，还没有到长沙，就有人来信劝阻他了，说“轮船不宜至省河”，他当然不理。他毕竟还是钦差，奉旨赏假到了长沙，却没有人来迎接他，他也无可奈何。

　　朋友来，劝他别谈洋务，被他顶了回去：不可不谈！不谈洋务，何以保国？王闿运曾对人说，郭嵩焘应是当国做事的材料，立即就有所谓坊间妖言，说郭之作相，则天下大乱。

　　郭嵩焘病逝了，闿运记曰：“竟不入相，妖言无凭也。”妖言无凭，但有影响。李鸿章奏请朝廷赐谥，即被否决，说郭嵩焘“出使西洋，所著书籍，颇滋物议”。其时，光绪帝亲政已有两年了，连热衷西学的皇帝都不敢捅这个“妖言”的马蜂窝，以至于义和团运动兴起时，还有京官请戮郭尸，以谢天下。郭无惧于妖言，不怕成为“人民公敌”，有李鸿章知己，一生已足矣！

**梦醒者的痛苦**

　　郭嵩焘是清朝政府正式派出的第一个驻英法公使。当时的大清国里，王公大臣和名士们还停留在“闻洋人之长便怒、闻洋人之短则喜”的外交认识水平，因此把出使看作有损清名的差使。更何况清廷这次派使是为“马嘉理案”向英国道歉。他的湖南同乡为他此行感到羞耻，企图毁掉他的老宅。当时，甚至流传一首极为尖刻的对联：**出乎其类，拔乎其萃，不见容尧舜之世；未能事人，焉能事鬼，何必去父母之邦。**

　　但郭嵩焘认定时局正艰，不忍坐视。他总结鸦片战争以来的经验教训，认为单纯靠义愤填膺和空洞议论是无补于艰危的。**如果能多一两个了解洋人情伪、谙习其利病的人，自然可以多一重应变之术。他决心做这样的明白人，到西方去学习他们的“强兵富国之术”、“尚学兴艺之方”，特别是探究“其所以通民俗而立国本者”。取西方之长，补中国之短，由器而学而政教，这说明郭嵩焘的认识的确比当时人要高一筹。**

　　郭嵩焘到英、法等国以后，周咨详访，博览群书，见识与学问都突飞猛进。**他不仅认识到西方文化也有源远流长的发展过程，而且把“巴夫子”（柏拉图）、“亚夫子”（亚里士多德）等西哲与“孔夫子”、“孟夫子”等东哲相提并论，而且还特别推崇西方近代哲学与科学的发展。他说：“英人谓天文窍奥由纽登（牛顿）开之，此英国实学（科学）之源也。相距二百三四十年间，欧洲各国日趋富强，推求本源，皆学问考核之功也。”**

　　当然，最为可贵的还是他在政体（国本）方面认识的进步。他逐渐摆脱君权至上的束缚，不仅敢于考究西方民主政体，而且敢于肯定其优长之处。他说，西洋的国政一概公之于民，而中国自秦汉以来二千余年的国政，却正好与此相反。他曾列席旁听英国下议院的辩论，也曾认真研究英国议会政治发展的历史，结果认识到：“推原其立国之本末，所以持久而国势益张者，则在巴力门议政院（Parliament）有绍持国是之议，设买阿尔（Mayor，市长）治民有顺从民愿之情。二者相持，是以君与民交相维系。迭盛迭衰，而立国千余年终以不败。人才学问相继以起，而皆有以自效。此其立国之本也。”

　　上要议会政治，下要地方自治，这是清末立宪派在20世纪之初的政治纲领，而郭嵩焘在30年以前已经有此初步认识。

　　经过一段海外生活的实际体验，他逐渐认识到当时中国在世界文明中的位置。1878年春，英国《泰晤士报》抨击政府近年授波斯国王勋章一事，认为“半文明国家不足以授勋”。他感慨说：西洋人将国家分为文明的、半文明的、野蛮的，而中国被称为半文明的。但汉代以前，只有中国有教化，其余地方中国人都称之为“夷狄”。现在都翻了个，如按文明发展程度区分文野，现在轮到欧洲人视中国为“夷狄”了。中国士大夫到现在还沉浸在“华夏中心”的迷梦中，怎不令人悲伤啊！

**三大“罪名”**

　　一个年逾花甲的人，读了大半辈子儒学经典，头脑里塞满了“吾闻用夏变夷者，未闻变于夷者也”等“天朝”之类的旧观念，现在却敢于承认西方的先进与中国的落后，而且承认得这样彻底，这在当时需要何等的勇气。

　　也正因为如此，他便为这个社会所不能容忍。**在当时的条件下，就他所从属的那个社会群体而言，他已经走得太远。于是他难安其位，不断受到攻击，而最为恶毒的攻击便来自他的副手刘锡鸿。**

　　此前，郭嵩焘曾把使英途中见闻逐日详记，辑为一书，名为**《使西纪程》，其中有称赞西洋政教修明、中国应采用其治国之道等语。他将书寄回中国后，呈总理衙门刊刻，一时激起满朝士大夫公愤，要求将其撤职查办。**

　　翰林院编修何金寿参劾他“有二心于英国，欲中国臣事之”；结果此书被清廷申斥毁版，严禁流行。

　　此事发生后，他的副手刘锡鸿认为时机已到，立即起而指责郭嵩焘有“三大罪”：1.“游甲敦炮台披洋人衣，即令冻死亦不当披。”——居然穿了外国衣服。

　　2.“见巴西国主擅自起立，堂堂天朝，何至为小国主致敬？”——见了外国国王居然站起来。

　　3.“柏金宫殿听音乐屡取阅音乐单，仿效洋人之所为。”——听音乐居然拿音乐单。

　　刘锡鸿还公然在使馆中扬言：“此京师所同指目为汉奸之人，我必不能容。”并又密劾郭嵩焘“十款”，极尽罗织诬陷之能事。刘锡鸿指责郭嵩焘的罪状，不仅是鸡毛蒜皮，而且都合乎国际礼仪，并可印证英人所说郭为“所见东方最有教养者”的称誉无误。但由于守旧势力的强大和大权在握，从朝廷到京师大夫充满一片唾骂指责之声。他只得在任期未满（仅仅一年零七个月）的情况下，奏请因病销差，清廷立即诏允并以曾纪泽接任。

　　郭嵩焘在唾骂声中出使，又在唾骂声中回国。

　　出使之日，他还满怀壮志，期望引进西方治国之道，使中华振兴并臻于富强；铩羽而归之后，他已失去继续奋斗的信心，因而又称病乞休，归隐乡里。郭嵩焘于1879年5月5日乘船到达长沙。当时湘阴正好发生守旧排外风潮，形势颇为紧张；连用小火轮拖带木船到省城都受到长沙、善化两县的阻止，大骂郭嵩焘“勾通洋人”的标语贴在大街之上。

　　尽管郭嵩焘钦差使臣的官衔暂时尚未解除，而自巡抚以下的地方官员都“傲不为礼”。他内心的愤懑和孤寂是不言而喻的。

**思想先驱者的命运**

**思想界的先驱，在其初始阶段总是处于少数地位，而他们的孤独感又总是相通的。**

　　郭嵩焘在返国途中，曾检阅龚自珍集，认为从中可以领悟“处小人治凶顽之道”。刘锡鸿之流不就是鬼蜮与豺狼吗？在这个蝇蚁蚊蚤横行的社会，希望与前途究竟在哪里？船到香港，郭嵩焘曾上岸与正在香港主编《循环日报》的王韬晤谈。船开行后，郭嵩焘回忆1855年在上海拜访王韬于英华书屋的情景，在当天的日记上写道：“顷阅子潜（王韬）

　　《瀛土需杂志》，念之恍佛如昨，距今二十五年矣。一日之雅，雨舟之谊，潇潇风雨怃然于心，诵东坡‘人生到处知何似，应似飞鸿踏雪泥’之句，为增怅悒。“

　　如果说，郭嵩焘早在甲午战争十多年以前即已批评洋务集团学习西方“是治末而忘其本，穷委而昧其源也”；那么，在1884年以原两广总督张树声遗折形式出现的一篇政论，即已对西方国家之本作较为具体的探求，并且明确认为应该着重学习西方富强之本。遗折说：“夫西人立国，自有本末，虽礼乐教化，远逊中华，然驯致富强，具有体用。育才于学堂，议政于议院，君民一体，上下同心，务实而戒虚，谋定而后动，此其体也。轮船、大炮、洋枪、水雷、铁路、电线此其用也。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，无论竭蹶步趋，常不相及，就令铁舰成行，铁路四达，果足恃欤？”同时，此折还有“圣人万物为师，采西人之体，以行其用”等语。

　　同在1884年，郑观应《南游日记》也有极相类似的语言。

　　中国在甲午战争中败于日本后，洋务运动的内在弱点充分暴露出来，“中体西用”经过实践检验表明局限甚多，因此，后来者如谭嗣同等对其批评也日渐激烈而深刻。因为实质上讲，摆出一副公正持平姿态的“中体西用”说，尽管不再赤裸裸地公开反对向西方近代文明学习，但其貌似维新却在骨子里维护了农业宗法社会安身立命的根本。

　　而癸未年前后，中国尚处于学习西方的第一个阶段，人们的认识尚停留在“中体西用”的水平，许多清流之士甚至还达不到这个水平。更何况郭嵩焘的思想明显超出同侪，无怪乎当时的朝野上下不能容他。

　　郭嵩焘自1879年黯然归国后，晚景甚为凄凉。尽管英国《泰晤士报》、上海《字林西报》载文称誉郭嵩焘，并盼朝廷起用郭氏，洋务派官员刘坤一等也一再上奏请召用郭嵩焘，但直至郭嵩焘终老于湖南老宅，再未得朝廷起用。曾力主官府应扶植私营经济、把官有资产交与商人经营的郭嵩焘，晚年三次申请开办轮船公司，第三次还直接得到权倾一时的李鸿章的支持，但终归化为泡影。本**想经由考察西方强盛之道而报国的他，在“公论”大潮面前，无可奈何地成为观潮者。**此种心境，他只能诉诸笔端，在晚年的一首《戏书小像》诗中，他叹息道：“学问半通官半显，一生怀抱几曾开！”不过，他也自信：“流传百代千年后，定识人间有此人。”

　　1891年，中国近代化的先驱、后半生再未摆脱“汉奸”之名的郭嵩焘郁郁病逝。虽有官员请旨按惯例赐谥、立传，但朝廷颁旨说：“郭嵩焘出使西洋，所著书籍，颇滋物议，所请着不准行。”直到他死后9年，当义和团运动高涨之际，还有京官上奏请开棺鞭戮郭嵩焘之尸以谢天下。

　　（本文写作得到华中师范大学章开沅教授的大力支持，文中部分材料引自其著作《离异与回归》，谨致谢意）

人物评价

1.郭嵩焘是近代洋务思想家，是**中国职业外交家的先驱**。 郭嵩焘的一生鲜明地反映出时代特征，**反映出方生与未死之际先行者的历史命运**，他早年强调经世致用，坚忍不拨，不尚玄虚，掘弃浮词的湘学传统，出使英治大使后，郭嵩焘认真学习了英国的政治体制、教育和科学状况，访问了学校、博物馆、图书馆、报社等，向中国政府提出了只有学习西方的政治和经济，"先通商贾之气，以立循用西方之基"，即发展中国的工商业才是出路，郭嵩焘因此名噪朝野，1884年郭嵩焘在其遗折中明确地认为应该着重学习西方富强之本，说:"夫西人立国，自有本末，虽礼乐教化，远逊中华，然驯致富强，具有体用。育才于学堂，议政于议院，君居一体，上下同心，务实而戒虚，谋定而后动，此其体也。轮船、大炮、洋枪、水雷、铁路、电线此其用也。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，无论竭蹶步趋，常不相及，就令铁舰成行，铁路四达，果足恃欤?"同时，此折还有"圣人万物为师，采西人之体，以行其用"等语。 我们考察历史，反顾来路，称郭嵩焘是中国十九世纪末维新派的先声，是二十世纪上半叶"全盘西化论"的嚆矢，当不为错。郭嵩焘痛恨反手关家门，力主开眼看世界，早已被证实是明智之见和明智之举，他是超越时代的先行者，生前没有知音，没有同道，内心寂寞如沙。郭嵩焘主张学习西方的蓝调文明，面对重重阻力，真可谓是"雪拥蓝关马不前"，他叹息过、苦恼过，却从未绝望过，相信未来，内心始终怀抱着沉重的乐观。事实证明，郭嵩焘是对的。

2.郭嵩焘一生著述颇多，主要有《养知书屋遗集》、《史记札记》、《礼记质疑》、《中庸质疑》、《使西记程》、《郭侍郎奏疏》、《养知书屋文集》、《郭嵩焘日记》等，对后人影响极大。